

关于现代中国学新范式的思考

——兼评加加美光行教授论文《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共同态度性的提倡》

杨栋梁

(南开大学)

加加美光行教授的论文《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共同态度性的提倡》，系统地梳理了源自美国的地域研究发展史和战后日本的地域研究及中国研究史，鲜明地指出了不同时期地域研究及中国研究的特征，深入分析评价了战后以来围绕“西方中心论”及中国学界命名的各种“后学”所阐释的各种观点，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提倡共同态度性，构建现代中国学新范式。论文抚今追昔，画龙点睛，旁征博引，气势恢宏，读来颇多启迪。由于学科出身不同和知识积累有限，本文拟对照中国日本学研究的现状，就如何构筑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略舒几点浅见。

第一，关于现代中国学的研究内容。这似乎不是此次会议的讨论重点，加加美教授也未就此展开论述，但这也并非是每个研究者都很清楚其边际和内涵的问题。“现代中国学”中的“现代”一词，是在强调其与以往的中国学研究范式相区别的意义上使用的。加加美教授追述了以往美国、日本等在“地域研究”框架下中国研究的关注点，但是没有对早已存在的“汉学”、“东洋学”等展开评论并予以定位。

现代中国学研究所包括的内容，是否应涵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涉及的所有内容，并且是否应是二者有机结合的全方位研究，这也是需要中国学研究者共同探讨并取得共识的重要问题。

第二，关于现代中国学的研究方法。加加美教授指出，学者们普遍认为“地域研究虽然是跨学科的，但也不过是诸多学科在此相遇的‘场’（Arena）而已”，因此“几乎不可能确立类似于其他学术领域的各种专门科学所具有的那种一般性理论”。事实上，中国学界包括日本学在内的国别研究也是处于同样的状况。

亚洲经济研究所林武氏早在1960年代阐述的“整体研究”和“综合性把握”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中国学应该是一种比单一学科性质的中国历史学、中国经济学、中国政治学、中国社会学乃至中国文化研究更高层次的学问。它不是学科层次的关于中国研究的简单聚合，而应是融汇和运用所有可能的理论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入手，研究处于历史发展纵轴线或横轴线上的各种中国问题。

“盲人摸象”是中国妇孺皆知的寓言故事，说的是一群盲人用手摸了大象后留下的印象，

于是摸了象腿的说大象像柱子，摸了象身的说大象像堵墙。公平地说，盲人们对大象部分肢体的形象描述并无大谬，但对大象进行整体描述时却完全错了，原因是他们每个人仅仅了解了大象的一部分。

传统的专门学科意义上的中国研究各自有其特定的理论方法和价值，它可以使研究在特定的专门领域取得深入，但是其局限性也如同盲人摸象，结果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外国的中国经济研究者如果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而不去注意影响经济的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就很难对中国经济做出正确解读。同样，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者如果不了解几千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深刻内涵，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判断就只能停留在肤浅水平。

如此说来，现代中国学应该是一种从历史时间到历史空间的全视角的立体研究，研究方法上不能是各种专门学科理论方法的简单复合，而应是不同理论方法的有机融合。这也意味着，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学学者是很难的，因为他应该具备一种超然于单一学科的学问之上的知识和综合素质。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以对方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学科门类的研究者皆在千人以上，但却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具备上述综合素质的“中国学”或“日本学”研究群体。这或许正是通过此次现代中国学新范式研讨会来促进自我认识的任务之一。

第三，关于现代中国学的研究目的。佳佳美教授指出：不仅战后初期美国的地域研究具有明显的“国策研究”指向，战前和战后一个时期日本的若干地域研究及中国研究机构也未能摆脱“国策研究”的影响，从机构设立的初旨、机构创立者的思想主张等可以发现“国策研究”具有连续性。当然，佳佳美教授同时指出，有关机构中的研究者并非都是以“国策研究”为目的进行中国研究的，自由学者始终存在。

中国学作为一种“学问”，自然涉及到其学问的目的问题。对此，中国学界历来存在“穷理”和“经世致用”的争辩，前者重视认知，强调学问的目的在于辩明事物真伪，释清事物结构，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真谛；后者重视实践，强调学以致用，具有现实主义乃至实用主义的指向。现实社会中，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不问政治”、理性从事学术研究的“纯学者”是存在的，但绝不会是多数。即便是抱有此类“目的”的学者，由于其知识、视野的限制，也不可能研究上完全再现客观，因为科学无止境，认识也无止境。另一方面，即便是带有“国策研究”指向的研究者，也不乏满腹经纶之人。中国清末的梁启超无疑是一位“国策研究”者，但他作为同时代佼佼学者的地位也是不可撼动的。

如此说来，现代中国学研究要将“国策研究”的成分完全剔除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旨

在穷理的认知性研究和以实践、为现实服务为目的的研究原本是一对与生俱来的双胞胎。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但是在“纯粹的”学术研究和所谓的“国策研究”之间，往往难以划出一道泾渭分明的鸿沟。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现代中国学时保持一定程度的宽容也是必要的。

第四，关于现代中国学的研究态度。这是加加美教授论文中着力阐述的重要命题。佳佳美教授指出，战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进行的以亚非拉为对象的地域研究，未能摆脱西欧中心主义思想结构的束缚，并且具有国策研究的目的指向。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尽管思想界先后出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福科的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的建构主义和胡塞尔的还原主义等新流派，以及“周边资本主义”理论、“依附理论”、“中心—边缘理论”，并且这些流派和理论具有修正“西欧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错误认识结构的意图，但是“克服了‘东方主义’弊端的真正的‘当代中国学’和‘亚洲学’实际上至今并未确立，现实中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以及‘地域研究’的整体世界认识依然继承着‘东方主义’的衣钵”。加加美教授认为，导致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对东方主义认识结构的批判还不彻底”，是“东方主义的认识结构具有牢固的持久性”，此外还存在着一个“对自由主义=现代主义通过‘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张’来实现其全球范围的胜利表示怀疑的人剧烈减少”等客观原因。

为了彻底打破地域及国别研究中“西欧中心主义”、“东方主义”及各种“后学”理论不同程度存在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主客分离、研究主体凌驾于研究客体之上的认识结构，加加美教授强力主张以国别学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地域研究或国别研究，即中国研究要成为“中国学”。为此，加加美教授提出了如下结论性观点，即新范式的中国学乃至国别学需建立在一种“共同态度”之上，这种“共同态度”包括的核心内容是，第一，彼此承认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各自具有的主体性格及平等地位；第二，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要相互影响和联动；第三，在主客体各自存在的主观价值判断的协调、结合和对立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得出新的研究结论。

显然，加加美教授把研究的“共同态度”放在如此高度位置，是针对以往的地域、国别研究中始终无法克服的“西欧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等认识结构及“国策研究”指向=不合理的范式而言的。态度反映了一种意识、立场、指导思想、价值观乃至世界观，发达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的居高临下式的发展国国别研究，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发展国对发达国的国别研究同样既不能是一种“从属型”、也不能是一种自我独善的态度。加加美教授的这些论断未必是完善的，但是其高屋建瓴地问题意识，可以说抓住了要害问题，其所提示的共同态度三点核心内容，反映了深邃的理论思考、科学态度以及向传统的思想认知方式发

出正面挑战的勇气，对于构建中国学的新方式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第五，中国学界对“日本学”范式的探索。与日本学界使用“中国学”一词一样，19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学”一词被引入中国并已成为中国日本研究学界目前常用的“熟语”。中国以“日本学”命名的学术期刊有《日本学刊》（中华日本学会和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合办）、《日本学》（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和《日本学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有关日本学的学术会议也曾多次召开，例如，1998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现日本研究院）就曾邀请国内13家主要日本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在南开大学举办了题为“中国日本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专题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除了交流各自单位的日本研究状况外，就日本学研究的课题和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此次会议主要代表的发言刊登在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第3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

至于中国的日本研究界何以从那时起开始采用“日本学”一词，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1980年代是中国全面学习日本的时期，日本研究由最初的主要学习日本经济成功的经验，向学习日本文化乃至日本人的优良素质深入；二是与中曾根内阁时期大力推崇的“文化大国”、“文化输出”政策及世界性的学习日本文化高潮密切相关。

一般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对“日本学”的理解包括以下诸点。其一，它是一种有别于西方且与中国不同的日本特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第二，近代以来日本之所以在物质、精神、制度层面上成为东方国家中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发达国家，是与日本民族及其社会的特质密不可分的，这反过来也说明了现代化过程中日本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价值及其强大生命力；第三，应该从不同的视角入手、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把握日本文化或文明的整体结构，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或学问可称为“日本学”；第四，不排除研究者中存在的以日本“成功”的范例来抵消“西方中心论”、进而增强文化上与日本颇多相似的本国发展信心的潜意识。

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大学、社会科学院及各级政府所属的有关部门。一般说来，大学以学术研究为主，后者以现状及对策研究为主。但就研究者个人而言，并无从事何种性质研究的限制，研究的内容和观点原则上是自由的。

但是，坦率地说，中国学界对“日本学”的认识还限于初浅水平，“日本学”还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不能作为一个独自的学科体系存在，日本学研究的思想认知结构中各种“态度”俱存。这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状况大同小异。由此看来，构筑国别学研究的新理念乃至“新范式”，将是各国学者共同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佳佳美教授论文，对于构建现代日本学的新方式，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参考。